

“这个世界上,有 3 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医学、文学、心理学,蒙命运垂青,我一一涉足。”

心灵捕手毕淑敏

■本报见习记者 张晶晶



2013 年 1 月,雾霾笼罩下的北京城,各式各样的口罩再次成为一道特殊的景观。你或许记得,上一次的“口罩热”已经是 10 年前的事情。10 年后的这个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毕淑敏用她独特的方式拾起了那段并不遥远的记忆。中学时代就听说过毕淑敏,在羞涩的年纪里看到《拯救乳房》这样的书名还会本能的脸红回避。现在回想起来,若能早早地读一读,或许能在面对这个世界时多一点准备。这是毕淑敏新文集《星光下的灵魂》发布会,推广语是这样写的:“《星光下的灵魂》集合了 2009 年~2012 年间毕淑敏尚未出版的所有散文,以 11 次灵魂拷问、44 篇心灵美文、30 个有问必答的形式,更透彻地叩问灵魂的居所,安顿疲累的心灵。”

拷问灵魂?看到这样的词语不由让人心头一紧。拷问灵魂的人,这位毕先生该有怎样的容颜?中式黑衣,颈上搭一条绣花围巾,体态丰腴,脸上始终笑意盈盈——坐在记者对面的沙发上,很难想象亲切如邻家阿姨的她就是蜚声文坛的大作家毕淑敏——她开口说:“谢谢大家能来这场见面会,看到这么多人,就会觉得文学还是大有希望的。”

语速缓慢温柔,但却不会失了穿透力,加上脸上时时的笑容,让人很难将注意力移开。能够让人安静地听她讲话,或许这就是毕淑敏的魅力。

10 年后的报告

10 年前的那个春天,毕淑敏正在家里陪伴生病的母亲。某日中国作协突然打来电话,希望她能参加 SARS 的作家采访团。毕淑敏坦承自己当时十分犹豫,她说:“其他作家都是写了决心书的报告文学家,就我一个写小说的。当时不知道会那么快回家,甚至以为我回不了家了。如果当时我母亲病危,我可能也没办法回家,我可能连母亲最后一面也见不到。我很迟疑。作协也表示理解,说不勉强,但我妈妈听到后说你去吧,我说我可以不去,但妈妈还是让我去。”

采访之后其他同去的人都在一两年内交了稿,唯独剩下她迟迟没有动笔。她说自己不着急,要把得到的东西在水里投一投、弄清了,把留下来的,最精华的部分写下来。

2011 年她决定动笔开始写关于 SARS 的一本小说,不同于别人的报告文学,她用了小说的文体,而且还是科幻小说,名为《花冠病毒》。

“20N 年,一种极其罕见的嗜血病毒——‘花冠’突然袭击燕市,这座拥有千万人口的都市,沦为猎物。拥有心理学背景的女作家罗纬芝临危受命,成为莅临抗毒一线的采访组成员。

在抗疫小组内,罗纬芝深入了解了各色普通人面对恐慌和毁灭时的心理困境。无意中,罗身染瘟疫,命悬一线,却又不可思议地获救,成为病

毒‘刀’下唯一的幸存者。事件发展不断失控,官方急救药物却迟迟研发不出,各方势力都想从这场病毒虐杀中获利……”

毕淑敏说不要纠结于书中的一些技术细节,不要擅自服用书中提到的某种神奇元素,不要对病毒噤若寒蝉,甚至不要和 SARS 对话入座,不必寻求真实的燕市在中国的什么地方。

但不去做这样的对应实在很难。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个善于遗忘的民族,对于苦难有着惊人的遗忘本领。但令人欣慰的是,有着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开始回忆 SARS 十年,缅怀在那场灾难中逝去的亲人,从苦痛中汲取到继续前进的力量。

文学的白衣天使

《花冠病毒》一书里附赠了一张心情卡,只要用大拇指按住卡上的液晶片,持续 10 秒,松手后观察液晶片的颜色,即为对应的心情指数。蓝色、绿色为正常、愉悦,红色、紫色、黑色则代表压力沉重、焦虑抑郁……

心理咨询师是毕淑敏的另一个身份。她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虽然我现在不直接从事医生这个职业,但我是有医生资格证的。心理咨询师同样有认可的资格证书,做这个的几年里,每天有太多人来,我的精力根本无法集中,没有时间旅行和写作。就算一天接待 7 到 8 个人,一年不间断也才 2000 多个人。我觉得写书,与大家分享可以更多地解决问题。有时候心理疾病就是一念之差,佛经里有句话叫‘一念三千里’,或许换个角度看,问题就解决了。我就想通过我的分享,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王蒙送毕淑敏一个称号,叫做“文学的白衣天使”,依葫芦画瓢,记者觉得她也可以算得上“文字心理治疗师”。毕淑敏跟记者说自己之前很喜欢谈论“正能量”,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事情。但是朋友却跟她说不要再讲“正能量”了,这个词都臭掉了。

可她还是说了,尽管不怎么提到这三个字,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仍在她温柔笃定的声音里,在她笔下的风景中。

《花冠病毒》出版时,关于赠品毕淑敏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电子体温卡,往额头一贴,就可以知道体温;另一个就是上文提到的心情卡。两种卡片都十分有趣,但是只能二者选其一。

“出差在外,夜里不舒服,是不是发烧了?你不知道。这时从钱夹里抽出这张卡,一测便知分晓。多实用!”医生出身的毕淑敏一开始觉得体温卡不错。

在决定选择的截止日,毕淑敏正在加拿大北部山地赶往观看北极光的途中。她向导游咨询意见,问他希望得到哪种卡片。加拿大华裔小伙子毫不迟疑地说,当然是心情卡!他说自己身体好,常年也不会发烧生病,体温卡对他可有可无,但心情卡很好玩儿,一天可能会测上好多多次,还会让朋友们一起测。

“我又问身旁的,都说喜欢心情卡。于是,

我都没立场地决定从众。”毕淑敏回忆,“有人问我发这张心情卡是要一边读我的书一边摸卡,测试自己读每一页的心情吗?”

毕淑敏被这话逗得笑弯了腰:“想想看,一边翻着书页一边测心情,这也太折磨人了吧?”

心情卡虽然只是个玩具,但却有提醒读者保持心理健康的功能。即使“正能量”一词已经被过度消费到臭名昭著,也不会影响相信之人的乐观积极。

《圣经》里说:“信,必得。”

幸福旅人

2008 年,毕淑敏和儿子自费 40 余万元,乘坐“和平号”游轮环游世界。114 天的环球航行不仅饱览风景,构筑了她和儿子之间珍贵的回忆,同时也使她对生命有了新的感悟。旅行结束后毕淑敏写了《蓝色天堂》一书,记录自己在途中的点滴感悟。

在序言里,她写道:“我不相信地狱,但是我相信天堂,我所笃信的天堂,它不在天上,只在尘世。人间本该就是天堂。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天堂的一角,学会欣赏,懂得珍惜,谁都能成为天堂里最幸福的人。”

毕淑敏说自己原来并不喜欢旅行。年轻时她在西藏阿里当兵,每次回家探亲都是万里奔波。

“我觉得旅行是个挺辛苦、充满意外的事情,而我内心里喜欢安定,不要有那么多时刻的刺激和惊悚。但同时我又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和兴趣。”

她说自己幼时读那篇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就幻想有一天也可以乘船环游地球。“虽然之前在其他地方有飞机环游的活动,但是那样太快,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坐船,一点点地去探索,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

环游回来之后除了出版《蓝色天堂》,毕淑敏还去《百家讲坛》讲课,题目是“破解幸福密码”。其实在这之前,央视已经跟她沟通了多次,希望她能上节目,但都被她拒绝了。理由一是自己不是老师;二是上电视很容易招来人们的议论。

她说:“我好好写作就是了,干嘛去招人这种议论呢。但环游回来后,勇气比原来多了一些,经过长途跋涉,看到大自然的威力,世界如此辽阔,我的勇气增强了一点。”

20 世纪 80 年代曾有一篇文章报道说,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最幸福的人有四种:第一种是刚给孩子洗完澡、怀抱孩子的妈妈;第二种是治好病人目送他离去的医生;第三种是在海边用沙子建成堡垒的孩子;第四种则是写完作品的最后一个字的作家。

这四种情景毕淑敏都经历过,但她却没有觉得幸福,“当时真的吓了一跳,感觉需要解决思想上对幸福的感知。从此以后就特别关注幸福的事”。

她试着重新观察自己的生活,才发现原来自己拥有许多幸福。“人思想上的转变非常快,训练一下,转念一想,就会觉得这些都很幸福。因为幸福是自我的感觉,不需要别人评级。”

《花冠病毒》里的罗纬芝性格爽朗,敢爱敢为;现实中的毕淑敏笔耕不辍,面若桃花,温婉动人——旅人的幸福,不用言明,亦自在悠然。

从阿里的卫生员到作家,从作家到心理咨询师,毕淑敏的人生亦是一场精彩的旅行。

已年过 60 的毕淑敏说自己 60 岁的时候觉得非常奇怪,自己早前的一些记忆开始复活。她说自己清晰记得 17 岁时在西藏阿里的山上仰望星空时的感受,“自己万分的渺小,而生命是刻不容缓的短暂”。

17 岁时毕淑敏穿上军装,告别北京,成为西藏阿里地区的第一批女兵,驻守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三山聚合,平均海拔高度在 5000 米以上。高原群山的雄伟与严酷的环境,战友生命的悄然消逝,给年幼的她极大的震撼。过早的接触死亡对于年幼的她或许十分残酷,但只有明白了死,才能读懂生。年轻时的经历,让她形成了善良、乐观、平和、冷静的个性。

毕淑敏说:“我在西藏发现,原来这些山是亿万年生成的,而我最多活不过百年,和这些山相比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因为我不断地在处理那些战友们年轻的尸体,我就想这样的命运很可能转瞬就会落到我头上。我真的那时就决定我这一辈子会依循我的想法,让自己很快乐,很开心,尽可能地给别人一点帮助。我从 17 岁开始就立下这个信念,到现在毫无改变。”

无论是做医生、作家,还是心理咨询师,对于毕淑敏来说似乎是同一件事情,只是用了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对她而言,每一个生命都是那样短暂、脆弱,那么宝贵、孤独。

“在每个人有限的旅程当中,我希望过得更快一点。在那些我们不得不承受苦难和悲伤的时刻,有更多相濡以沫的支援。让我们人生在结尾的时候少点遗憾。无论我做什么,所秉持的宗旨是一样的。”

谈到阅读,毕淑敏说自己认为着重在实用性上的技术类书籍在她看来算不得“书”。除此之外,一定要读一点“没用的文学”。

她说:“请各位在繁忙的工作之外,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写字楼,也不仅仅是这座城市,而是放到更大的空间里去。一天两天是没效果的,但是一年两年就会有一点效果,十年二十年以至于整个人生走过去,就会发现文学给予你的滋养是缓慢而持久的。”

春节后的北京正在苏醒,迎着回归的人们。虽然偶有雾霾,但阳光着实耀眼温暖。国贸、中关村重新变得熙熙攘攘,开工的上班族依旧行色匆匆。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春天。

只是,路边铁皮屋挤得满满当当的报刊里,偶尔会有“SARS 十年”几个字露出头来。中国人喜爱“10”这个数字,“10”似乎代表着一种圆满。不知该如何评价这种对于“10”的迷恋——好在 10 年了人们开始关注从前,坏在“怎么过了 10 年大家才会想要吊唁”?

我,病毒

东起大柳树,西南至官牛房,北靠后牛坊。因山而得名。这说的是昌平东边的小汤山。这座温泉古镇今日仍然宾客不绝,但它为大多数人所知,却是因为 10 年前的那场魔战。

毕淑敏还清晰地记得,那是 2003 年 5 月,这位女作家在中国作协组织下,来到小汤山前线采访。她曾经身穿特种隔离服,在焚化炉前驻留。她与 SARS 病毒如此贴近,她觉得自己闻到了它的味道。病毒其实是没有味道

“但凡我写出的或未写的,肯定与生命相关。我无法不尊重生命,这是我的习惯,深入骨髓。”

未知死,焉知生

■刘丹 张晶晶



油画《抗击非典》
赵振华绘

的,她闻到的也许是病人的排泄物和消毒液混合的味道。袋子密封非常严密,其实这味道也是闻不到的,只是她充满惊悚的想象。

“她说她要把采访内容留给以后写小说。”当时的作家们都记得。

同去的报告文学家早已写出了作品,她却一直找不到好的支点表达,不能动笔。8 年后,毕淑敏才开始写作这部与病毒有关的小小说。而这部作品距离她最初走向火线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几千个日夜。

在这部名为《花冠病毒》的“软科幻”小说里,她对医学狂人于增风身染病毒、灵魂出窍的呓语不吝笔墨——“我。病毒……共栖。久远。庞大。渺小……”

她将人性的幽暗之处,喻为“人心的花冠病毒”。

“人性固然不像我们想象般美好,但也并非无可救药。有心理学家说,做人是有期望的好事,所以我们才留恋这个世界。总体而言,人性总是要善良多一点,总是要感念亲情、世间真情。”

显然,人之波诡云谲,令她流连忘返。一如小说的收尾——“再见再会再来”。

再见,小汤山

10 年后,人们再次造访了那座 7 天 7 夜建起来的医院,却发现那片被灰墙拥围的百余亩土地上,已经丝毫不见当年非典的痕迹。废墟上长着刺柏和黄杨树,一排没有拆除的简易板房堆着些纸箱——外壳上清晰地印着“抗 SARS 捐赠物资”。

关于那场“人类共同的记忆”,时任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原解放军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张雁灵 2008 年出版了《回望小汤山》一书,书中回忆自己坐在刚搬来的办公桌前,写了一份请求处分报告的“军令状”:“等到小汤山战斗结束那一天,如果真有战友在这场战斗中被感染,如果真有战友在这场战斗中伤亡,请求组织上给予我最严厉的处分。”军人的铮铮铁骨感动了许多读者,有人说那是中国医患关系最为和谐的一段时间。当生命只能交给这些“白大褂”的时

候,会有人持刀相向吗?当“天使”肩负着别人最宝贵的生命时,面孔上是否会多出些许慈悲关切?

毕淑敏的慈悲凝聚在她的文字里。与那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作家不同的是,毕淑敏并不是居高临下地审视众生,而是以剧中人的姿态向人们娓娓道来,个中多了一份平和、一份关怀。

许多人相信,人类和病毒必有一战,必将多次交锋,谁胜谁负尚是未知数。只是当我们为寻找对抗病毒的武器和策略百般周折、乃至悲观失望之时,毕淑敏却给出了对抗危机的两个秘密武器:一个是“元素”,一个是心理能量。而前者无能为力之时,真正的希望唯有靠后者——当身体和心灵遭遇突变,最终能依靠的唯有心理能量。

如何生死

小说里的人们最终战胜了病毒,可现实中的患者方渤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10 年前,他的妻姐从东北来北京探亲,因感冒去医院看病,从此方渤的妻子、方渤,两

个女儿以及女婿等 9 人先后感染 SARS,在这场灾难中,方渤的妻子和妻姐死去。

病愈后他还上一档节目,对于自己能活下来充满感恩。但没料到的是出院半年后女儿就发现腿不舒服,检查结果是骨坏死。医务人员告诉他们有人发生了激素后遗症。接二连三,家族幸存的 7 个人里,骨坏死的有 5 个人,其中 3 个相当严重,其中就包括方渤自己。

10 年前,为了抢救生命,激素类药物曾被大量用于 SARS 紧急治疗。激素的副作用导致部分患者股骨头坏死和肺部纤维化,被称为 SARS 后遗症。这些当年看似逃过一劫的人们,今天又成为了“非典后遗症患者”。

之前有媒体报道,152 名非典后遗症患者在网上联名向社会求助,希望成立非典后遗症患者救助基金。本来以为已经拥有了春天的他们,却没想到依然身处寒冬。

10 年后的春天里,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如何让他们再次嗅到新生的香气。

关于生死,是毕淑敏所有创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

“但凡我写出的或未写的,肯定与生命相关。我无法不尊重生命,这是我的习惯,深入骨髓。”毕淑敏说。

对生死以及人心的探问成为毕淑敏文学创作的核心思想。透过以“珍爱生命”、“尊重生命”为立足点的写作,毕淑敏更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借由作家的责任感逼近生命的本真。“花冠病毒”形态绚烂美丽,与它的凶残形成某种强烈“反差”——而作者却不断借此病毒一手制造的毁灭性危机表现着人类生命的尊严,并肯定那些在危机中死亡的生命价值——死亡固然是一种不幸,是超越极限的人生痛苦,但它与生存的对立却恰恰标志着真实的生命存在。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10 年前那场灾难中蕴涵的危机和死亡意蕴,则让人们深刻体会到“知死,然后知生”。诚如小说通过对危机和死亡的书写折射世态炎凉,继而引发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和对生命价值的关爱那样,每个人都应当从危机、乃至生与死的角力中领略如何善待这仅此一次的生命。

十年之殇,轻舞飞扬,却又决决。